

历史五千年

中华名人大博览

之

四



沈阳出版社

中华名人大博览

张安华 尚光达 主编
张志强 秦 旭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蔡 锷	2005
邹 容	2036
朱 德	2077
廖仲恺	2098
李四光	2132
竺可桢	2165
陶行知	2197
郭沫若	2230
毛泽东	2265
宋庆龄	2291
杨虎城	2320
梅兰芳	2340
徐悲鸿	2374
茅以升	2405
叶剑英	2433
周恩来	2453
刘少奇	2484
瞿秋白	2518
老 舍	2552
沈从文	2587
华罗庚	2621

蔡 锷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民国初年名将。原名艮寅,字松坡。



书生从军

蔡锷是湖南省宝庆府亲睦乡人,生于1882年12月18日。父亲蔡政,字正陵,母亲王氏,生有五个孩子,蔡锷是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有二弟一妹。蔡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其父还是一名裁缝,农闲时往往外出干活以补家用。当蔡锷5岁时,全家迁到武冈县的三门王家板桥谋生。

蔡政虽是农家出身,却也粗通文墨,又做过商店店员,能写会算,可以帮助店员记帐。工作之余,自己还专心读书。后来索性做起了老师,专给孩子当启蒙老师。6岁的蔡锷便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依旧是科举考试主宰着教育的方向,社会上重文轻武,都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读的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著作。蔡锷入学以后,读的也是这些东西。但他智力过人,

又勤奋好学，还博览群书，因而文思十分敏捷。他常常在白天做农活，晚间则补习功课，经常读书到深更半夜。他父亲怕他累垮了身体，经常嘱咐他早睡。他则口里答应，但还是偷偷看书，直到油尽灯灭才肯上床睡觉。但他看书并不满足于四书五经。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就翻山越岭到别人那里去借。因为不是自己的书，他于是更加勤奋地抄录、记诵，即使是深奥玄妙的《道德经》他也照样熟读苦记。这样，到 10 岁的时候，他已读完四书五经，能构思，写作新颖、文句流畅的文章，13 岁就中了秀才，15 岁便到省城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在他的家乡，大家都把他当成“神童”，都希望他能早早成材。

19 世纪末，蔡锷虽然勤奋聪明，在旧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只懂旧学，即使仕途顺利，也难成材。因为在当时新学已兴起，而且在湖南学界掀起种种波澜。12 岁的蔡锷差点因家贫而辍学，好在宝庆著名学者樊锥爱惜人才，便免费收其为弟子。樊锥是一个思想十分开通的学者，他当时正在努力学习西学，主张维新变法。蔡锷投在其门下，既得继续其学业，又接触了新思想。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可算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渐渐地，宝庆已不能满足蔡锷的求知欲。1897 年，维新变法运动已在湖南蓬勃发展，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提倡新学，还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以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为总监，梁启超为中文总教司，李维格为英文总教司，唐才常等分任讲席。16 岁的蔡锷在督学徐仁铸的推荐下，从家乡徒步数百里来到长沙，报考时务学堂。因为在樊锥的指导下，他的新学已有所长进，因而这次便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这所以培养维新人才而著名的学校，他是时务学堂第一班 40 人中最小的一个。正是在这里，他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神童，他 17 岁时考取举人。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他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宣传家，对当时的知识界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自 1897 年他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以后，他通过教学活动，广泛地介绍西学，鼓吹变法，抨击清政

府的昏庸腐败。在课堂上,他常借《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中的变革、民本思想,宣传西方的民权思想。他还要求同学写读书札记,晚上,便对学生的札记进行逐字逐条的批改,有时一写就是上千字,其中尽是宣传新思想,宣传西学的东西。他还经常到寄宿生的宿舍里,给他们讲一系列清新、激越、感情充沛的道理,学生的思路一下子开阔了,人人都激动起来,想要跟着先生走维新的道路,改革社会上不合理、陈腐无用的东西。

蔡锷年纪虽小,但很能领悟先生的道理。因而深得梁启超的喜欢。他的提问和札记,大都是关于国家兴亡的大问题。有一次,他提问道:“孔子主张大一统,是要避免诸侯间的互相残杀,而现在那些贤士大夫,都只考虑把自己的省、郡、县管理好,这不是违背了孔夫子的主张了吗?”他的这个问题是针对维新派提倡的“地方自治”而问。梁启超给他做了详细的批答和解释。告诉他古今中外,道理都是一样的,小国纷争,则国家衰弱;小国联合,则国家富强,因此孔夫子主张大一统。西方国家虽然是地方自治,但大政方针则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而今天的中国则反过来了,如关系国家生存的军队,分成了好多派系,无法统一,而小小的抢劫案则由中央政府来管理。以致于国家陷入混乱而无法治理。因此那些贤士大夫只好想办法把一省一郡一县先治理好,好让其它地方有一个榜样。他还经常发挥梁启超在札记中的批语。在时务学堂里,蔡锷是英姿勃发,有着敏锐、新颖的思想,每次月考都是名列前茅,深得同学们的敬重、老师的关心。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里发挥民权思想,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了新旧两派的激烈争吵,甚至有人将梁启超的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的札记抄录了,并送交到清廷。新年后,梁启超身患重病,于是离开时务学堂前往上海治病,从而结束了他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在蔡锷从师梁启超的两个月里,他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感染,并为之奠定了追求西学、变革社会的思想基础。从此,梁启超

把蔡锷看成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同时也奠定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

变法运动在这时正走向高潮,梁启超未等病愈便由上海到北京,协助康有为召开保国会。并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起了“戊戌变法”结果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光绪这时虽已亲政,但实际上仍受慈禧控制,并没有实权。眼见慈禧准备反击,他们都束手无策,于是求助于握有兵权的袁世凯,而狡猾的袁却向实力雄厚的顽固派告发了维新派。慈禧于是马上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并大肆搜捕维新志士。康、梁二人被迫流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则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这时蔡锷仍在时务学堂求学。湖南巡抚陈宝箴对变法很热心,在公开招考学生,准备公费资助他们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国,改变祖国衰弱的面貌。蔡锷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他以第二名被录取。但他们还没出国,戊戌变法便失败了,陈宝箴也丢了官。而且时务学堂也被封,他不但不能出国,连学校也没有了。后来准备到武昌的西湖书院求学,但学校主持张之洞因慑于顽固派的势力而坚决不收时务学堂的学生。于是,他便和同学唐才常等一起去寻找自己的老师梁启超,这时梁启超正遭朝廷通缉,在日本流亡。但他们并不知内情,只是凭着一腔求知的热情,从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这时他们身上已几乎没有了钱,他们除了一面打听梁启超的消息外,一面又去报考南洋公学。蔡锷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但因时值暑假,还不能住进学校。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以前时务学堂的老师李逸群,在其帮助下提前住进了学校。

他们历尽周折,终于打听到了梁启超在日本的住址,于是马上给他写信,表达了追随先生的渴望。面对学生们的执著追求,梁启超深受感动。他自己亡命异国,处境已十分困难,他还是想法请唐才常资助了一点旅费,让他们来到自己身边。可想而知,流亡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却异常快乐。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日本求学的人很多,原有的华侨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梁启超便于这年夏天在东京开办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蔡锷便进了这所学校,他一面学习日语,一面研究政治、哲学。同时还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准备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好报效国家。

流亡日本后,由于势单力薄,便着手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接触,梁启超有时还高谈革命,但遭到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在日本成立保皇会,以营救光绪,恢复王权。康、梁便发起勤王运动,欲以武装力量推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唐才常在国内成立了自立会,主持勤王,蔡锷也参加了自立会。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一带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在清政府内,对义和团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方面要求利用义和团,另一派则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慈禧居间操纵,犹豫不决。帝国主义见清廷无能为力,便组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义和团的兴起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慈禧乱了方寸,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唐才常在康、梁的支持下,准备起义勤王。他们看到蔡锷还很年轻,劝其继续学业,但他见其他同学都回国起义,自己怎能袖手旁观,执意回国参加起义。为了不让蔡锷冒险犯难,便派其送信给在湖南的朋友黄泽生,约其一同起义。信送到后,黄泽生料定起义必定失败,于是坚决把蔡锷留在自己的身边,以便日后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果然,自立军原定在汉口的计划泄露,唐才常等骨干被捕受害。

由于受到黄泽生的保护,蔡锷没有出事,但他为同志的牺牲而悲痛万分。但通过这次失败,认识到书生空发议论没有什么用处,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还要有自己掌握的军队。同时,他痛苦地看到,外国侵略军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武装却不堪一击。于是,他决心弃笔从戎。为了改造国家,为了富国强兵,立志学习先进的

军事技术,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奋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蔡锷。锷是指刀剑的刃,他用这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借以表达军人以身报国的英雄气概,并立志要使国家有强大的武装,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不久,他又回到日本,反复向梁启超陈述了学习军事的志向。因其身材瘦小,梁启超笑他说:“汝以文弱书生,似难当军事之重任。”他却严肃地回答道:“只须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梁启超见其已铁心,并想法让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他用翻译、写作来支付学费。1902年,他从成城毕业,以候补生来到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其后,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不久,又设法补为官费生。于1904年11月毕业,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名列第五,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军事家的蒋百里名列第一。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同时毕业,因而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日本军校的训练是十分严格、艰苦、野蛮的。长期的苦读,已使他成为一个瘦弱书生。要经受军营的艰苦生活,非有坚强的毅力不可。他在军校学的是骑兵,更付出了大量血汗,并练就了一套精湛的骑术。后来,他的学生李宗仁回忆说他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他在体质锻炼上也十分刻苦。一次,他到横滨住了一个月,天天到海滨游泳,无论天晴下雨,从不间断。他以不懈的努力,刻苦的锻炼,终于成长为一名军事素养优秀的英武军官。

蓄志待发

蔡锷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因而他学军事的目的不是为革命,而是为勤王,他还在拥护光绪帝,主张维持清统治。

自他进入军事学校学习以后,便十分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武装状况,他再次深深感到,中国社会重文轻武,造成国家民族衰弱不

振,危机重重,因而率先提出军国民主义,鼓吹尚武精神。他的这一主张是在他的《军国民篇》中提出的。他希望通过提倡军国民主义,来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家衰弱的面貌。他强烈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士已认识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力图变法自强。而中国却国力孱弱,生气消沉。因而他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他还指出,军国民主义是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开始的,近代的帝国主义也是由军国民主义演化而来。而中国的汉族则太驯良、懦弱,因此自周汉以来,一直在外族的践踏下,俯首贴耳。汉族之所以腐败堕落到这种地步,他列举了八条原因:一是教育,太讲究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二是学派,受老子哲学影响太深,以致老子的柔、静、保守。自私流毒,泛滥天下。三是文学,中国诗词都不写从军的快乐,都是些悲恻苍凉的情调。最有感化力的小说也只是些下九流的东西,把国民的聪明才智都给堵塞了。四是风俗,深受“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影响。把国家的捍卫者看成卑贱的人。五是体魄,国民体魄衰弱到了极点,有文明的灵魂,而无野蛮的体魄。六是武器,中国武器发展了4000多年,还停留在刀矛弓箭的水平上。七是音乐,中国的音乐是靡靡之音,而无刚毅沉雄之音。八是国势,天下一家,没有竞争意识,国家观念淡漠。现在,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知道生存的艰难,知道要团结、勇猛精进,这样,中国的前途就有希望了。他还呼吁陶铸国魂,培养国民的军国民精神,以抵抗列强的侵略。虽然他的这些思想还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范畴,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但他也深深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的大量弊病,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军国民主义一时十分风行,大批知识分子弃笔从戎,许多人成了辛亥革命的骨干。他的这篇文章,起到了开风气的重要作用。

在他留学日本期间,虽年轻,但活动能力很强,在留学生当中相当活跃。他和刘百强、吴禄贞等创设励志会。还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宏扬民族主义。1901年，他又和一些同学一道创设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第二年，黄兴到日本，也参加了《游学译编》的创刊工作，并和他结成朋友。接着，他又倡议设立留学分馆，在成城学校创立校友会，以激励大家努力为国学习。他还和范源濂、吴禄贞、蒋百里等“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至于以何种手段达到目的，则由人自择。”他虽受梁启超的影响，持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但和革命党人的私人关系却很好。

当他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他的知名度无论在留学界还是国内军政界，都已相当高了。这时，清政府正在提倡新政，编练新军，而且也十分需要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才。于是毕业后，江西巡抚夏时调其主管村官队，但到任只有一星期，就因夏时被调走而告终。于是他又回到湖南老家。1905年春，他又受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但不久端方又被调往江苏。他于是留在湖南。不久，广西巡抚李经羲多次来电请他去任职，对李的盛情邀请，他不好过分推辞，便先去广西游历。但一到桂林便被李经羲留住，任他为陆军随营速成学堂总理兼创办测绘学堂，并会同督练新军。到任后不久，他便担任训练新军的重要职务。1907年初，张鸣岐担任广西巡抚后，又责成他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并任总办。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等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第二年，他又前往广西军事重镇南宁创练步兵，不久便又担任广西混成协第一标统带。1909年，他又担任了南宁讲武堂总办事兼办学兵营。

他在广西，虽很受官方和学界的欢迎，但也不尽如人意。他希望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对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又希望掌握军权，以便改造国家。但也深知改革不容易。多次改革的失败，使他变得深沉内向。因而朋友们很难理解他，他时感孤掌难鸣，难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同时，广西地势偏远，土地贫瘠，要想建立一支

齐装满员的新式军队也极不容易。他多次想离开广西,另谋发展,只因历任巡抚尽力挽留,他才留下。在这时,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一再在广东、广西一带组织反清起义。黄兴也多次动员蔡锷,他与黄兴是好友,也同情革命,但不赞成马上行动,对黄兴的每一次劝导,总是不答应,而是隐忍待时。1910年,广西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何遂、耿毅等在黄兴的介绍下来约见他。这时他已是督练会所三处及干部学堂总办事兼办学兵营,他们不敢直接面见他,便约他晚上9点到江南会馆门前一叙,但他们从8点一直等到11点,他也没有前去,从而使同盟会的同志对其政治态度产生了怀疑,为了防止他破坏革命,也开始设法排挤他。同时,广西新军的编练计划也因财政困难而遭挫折,原准备编练一个师,现在只好缩成一个旅,干部学堂中培养的200多名军官,也因此无法安置,他便采用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结果被录取的120多人中,湖南人占了3/4,从而导致了省籍偏见,引起了广西学生的强烈抗议。广西各界迅速掀起了驱蔡风潮,而且一直闹到北京。正好原广西巡抚李经羲请他到云南任职。于是,他借此下台,离开广西前往云南任职。

何遂等看到驱蔡成功,正在兴高采烈,不料他在离别之际,反而专设宴与他们话别。他们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心里忐忑不安。事实上,他早知道他们在广西的革命活动,但他也深知年轻人血气方刚,做事莽撞、缺乏考虑,也不知世事之艰难。在席间,他就善意地告诫他们说:“你们何苦撑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给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接着,他又拿过一个炮筒子放在何遂的面前说:“这个送你们作纪念,成大事的人要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他的这一番知心话,使何遂等恍然大悟。他离职后,便推荐革命党人方声涛担任兵备处帮办,并很快和何遂等走上一路。

蔡锷弃笔从戎的首要目标,是要建设强大的国防。他在广西任职时,兢兢业业,从事练兵,希望团结同志,使广西成为全国的枢纽。广西是边防重镇,也是抵抗外国侵略的前沿阵地。但清廷的腐败和革命风潮的激荡,使他的蓝图无法实现。他也不免感到消沉,有了一种不愿出世的念头,虽然到云南有很高的职位等着他,但他看不到什么希望。觉得办好一省的军事非一二人所能做到的。

1911年春,他自家乡来到昆明,不久便担任19师37旅的统领官。当时缅甸英殖民主义当局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边疆形势紧张。他希望厉兵秣马,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但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敢反击列强的侵略。他报国无门,恰好19师统制钟麟同让他编辑对部队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便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来发挥自己的治军和国防思想。

古人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的所谓“中兴名臣”。但蔡锷并不宣扬他们的忠君、名教的思想,除阐述治兵战守的基本原则外,就强调反对列强侵略,保卫祖国的军人职责。他特别研究了反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原则,研究了以弱胜强的用兵方略,并得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结论,为中国的军事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指出,我国由于没有实行后备兵役制,导致兵力不充足。另外,武器装备也不足,因此应该采用运动战,以诱敌深入,采取敌疲我打的方式可战胜敌人。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后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展。可以说,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军事学说。他的这种军事思想对于我国打败日本的侵略、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收复云南

当蔡锷来到云南之时,云南各地早已撒遍革命的火种。云南培

养新军军官的学校云南讲武堂就是一个革命的据点。总办李根源以及先后担任教官的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等都是革命党人。讲武堂的教官大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总办李根源早在日本的时候，就已加入了同盟会。学生受教官的影响，大都热血沸腾，蕴蓄着强烈的反清思想。朱德元帅当年就是讲武堂的学生，毕业后就在蔡锷的部队里当排长，积极向士兵和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但是，云南的主要军权却掌握在北洋系统的军官手里。他们思想顽固，仇视革命，对那些清新活泼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充满着怀疑和忌恨，从而产生了北洋派和士官派的派系冲突。

蔡锷面对云南军界错综复杂的关系，态度含蓄持重。他和那些士官派的人，很多是旧相识，但他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口头从来不谈革命，只是鼓励部队的爱国精神，加紧军事训练。他把他自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教育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李经羲并没有具体安排他军职，他也深知李经羲的良苦用心。因此和同盟会员之间仍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和默契。他还利用和李经羲的良好关系维护那些士官派的军官，使他们免遭北洋派的排挤。这样，他虽不是同盟会的成员，但在云南军界却享有很高的声誉。直到武昌起义前不久，李才任命其为19师三十七旅旅长。在关键的时候，他掌握一支富有革命精神而又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是他坚韧不拔的结果，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盟会的黄毓英在各地奔走革命，多次遭到通缉。这时来到昆明，和唐继尧秘谋发动起义。黄毓英精明强干，慷慨豪爽，勇于任事。为了弄清蔡锷的真相，他便毫不顾忌地前去找他，并向之吐露了自己的抱负，而且毫不隐瞒地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告诉对方。蔡锷非常钦佩他，并当即郑重地向他表明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从此定下了革命大计，并让黄在自己手下当了一名排长，不分日夜地动员革命。恰在这时，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全国形势大变，清廷已无法驾驭时局。他凭着自

己多年潜心的观察,充分意识到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是行动的时候了。他于是开始精心部署,准备大干一场。他对自己部队的军官进行了调整,让自己的同志担任军内一些重要官职,从而使自己牢牢地掌握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又派李鸿祥任 23 团的管带,以箝制北洋军官丁锦的势力。他部署完毕不久,革命的暴风雨便来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迅速地控制了武汉三镇。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在各地部署起义。云南的同盟会员,因长期深入新军内部,使他们积累了充分的力量,可以迅速行动起来。10 月 19 日,云南同盟会的成员唐继尧、刘存厚等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议,筹划起义。他们深信蔡锷在这风云剧变的时刻会和自己站到一起,决定下一次会议邀请他参加。蔡锷和云南同盟会成员来往已久,而兼之人品出众,才华横溢,深沉大度,学术精湛,深得同盟会员的信任和敬重。而且,他在军界系士官三期生,军职协统,许多人是他的部属。蔡锷既然是革命同志,他们决定推他为起义的领导。自第二次会议起,他欣然参加并主持起义的组织工作。

10 月 25 日夜,他们为即将展开的生死搏斗举行了仪式,歃血为盟,宣誓:“协心同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但这时李经羲听到起义的风声,准备收缴军队枪械,使士兵徒手而无法起义。蔡获悉李的意图后,立即于 28 日夜召开紧急会议,他趁人心振奋之际,决定提前发难,最后决定于 10 月 30 日午夜发动起义。在他主持下,会议仔细商量的起义计划,并推他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第二天,革命党人紧张准备起义,他便前往 74 团本部,并住宿在那里,以便起义时亲自掌握骨干力量。这时,清王朝已丧尽人心,总督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等风闻起义,但又找不到证据,不免草木皆兵,唯有抓住亲信部队,加强戒备。钟并于 30 日凌晨到 74 团训话,并当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当场追问起义的事,蔡锷见局势已摊牌,他便有恃无恐,并断然反击钟。钟此行是一无所获,反而限

入孤立,只好回本部去了。钟走后,新军中的有些人见消息泄漏,敌人已有准备,不如推迟起义。蔡锷当即召开骨干会议,坚持主张破釜沉舟,起义如期举行,并直接掌握了74团的领导权。但73团内部形势复杂,斗争激烈,在新军搬运武器时,被反革命派发现,双方立即冲突起来,管带李鸿祥看到局势严重,果断地把招集时间提前到8时40分,标统丁锦获知起义消息,马上率卫队前来镇压,但被李鸿祥指挥的起义部队击败。73团则向北进发,黄毓英开城迎接。当起义军进至五华山下,钟麟同已有准备,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

总督李经羲获悉起义军攻打五华山的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蔡锷,令其率军前往镇压起义。当时,他还在紧张地布置起义事宜,得到李的电话,方知情况有变。于是把起义提前到10时,招集74团和79团集合,并上台演讲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赞成者举手三呼‘革命万岁’。”起义官兵齐声三呼“革命万岁”。刘存原当即宣布公推蔡为起义临时总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步、炮两团完整的起义,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次日凌晨攻入城内,并前至五华山支援73团。起义军很快击溃敌人的顽抗,相继占领军械局、总督署。钟被义军杀死。躲起来的李也被搜获。后来,蔡锷、李根源等看在过去上下级的面子上将其送出云南。

10月31日,义军控制了昆明城,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督府”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定国旗为赤旗,以白色中字为心。云南起义,在蔡锷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获得了圆满成功,起义军部署严整,有秩序地控制了当地政局。都督府成立以后,蔡锷依靠起义骨干的有力支持,有步骤地着手变革。当时任连长的朱德回忆说,经过当时的改革,云南出现一种全新的面貌。云南自革命一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秩序,避免出现新革命过程中的混乱,这在当时起义各省中是少见的。

率军北伐

云南起义成功的前后，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各地，发展异常迅速。从10月底到11月初，长江以南各地除南京和四川以外，起义相继取得成功。长江以北的陕西、山西两省也获胜利，革命军旗飘扬在大江南北。城头易帜，河山变色。清廷为挽救垂死的命运，重新起用袁世凯，令其指挥北洋各军镇压革命，北洋主力直指武汉，11月，革命军被迫放弃汉口，11月3日，黄兴回国，接任武昌战时总司令，着手保卫武汉的战斗。在北洋军的压力下，湖北革命军浴血奋战，战况十分危险，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率师援鄂。蔡锷领导重九起义成功后，很快控制了云南全省，云南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云南新军又训练有素，是起义各省中的一支精锐武装。因此，各地革命军都要求蔡锷出师北伐，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计。然而云南偏处西南，交通不便，一支雄兵，关山难越，无法飞赴前线，再加上四川仍在清军控制下，遏制着滇军北上的通道。川军也自西向东，使湖北革命军有西顾之忧。四川革命党人纷纷上书云南都督府，要求蔡锷出兵援助。

1911年11月11日，他经过郑重考虑，分析全国的形势后，决定首先派兵援川，并着手组织援川军，以军务总长韩建铎为援川总司令，率一师的兵力，下辖两个团，前往四川。11月16日前后，援川军从云南出发，挺进四川。他们原抱着与清军死战的雄心壮志，援川、援鄂，直捣黄龙，推翻清王朝。

不料，在进军途中，形势发生了变化。四川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形势的鼓舞下纷纷起义。一批军校学生从上海到达重庆，策动起义成功，并宣布独立，由张培爵任蜀军政府都督，由于云南入川道路崎岖，行军缓慢，直到12月16日才到达叙府。这时，四川已掌握在革命党手中，抵抗的清军已大部分瓦解。这时全国的政局也发生了